

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 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

## MANZU SHENGTAI YU MINSU WENHUA

江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

江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江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1

(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ISBN 7-5004-5725-1

I. 满… II. 江… III. 满族-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7128 号

责任编辑 易小放  
责任校对 徐幼玲  
封面设计 诚信  
版式设计 王炳图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21.375 插 页 2

字 数 369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凝炼方向 凝聚队伍 凝结成果

——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  
“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总序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辽宁大学历史系）由于其历史学科具有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较雄厚的现实研究实力，在国家教育部“九五”“十五”“211”工程建设过程中，皆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在“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重点学科方向即学术立足点主要在哪里？我们怎样围绕主要学术方向设立项目、组织队伍、开展研究？等等。现在，辽宁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即将出版了，我们的思考也有了初步的结果。在此，特以此序述其缘由。

中国东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区域单元，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文明。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

作为祖国的边疆地区，东北地区陆地与俄罗斯、朝鲜等国接壤，有漫长的边界线；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亦有数千里海疆线。因此，边疆问题是东北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东北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曾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红山文化等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

东北又是中国众多民族兴起和发展之地。特别是自10世纪以迄近代，随着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陆续兴起，继而挺进中原，建立了辽、金、元、清诸王朝，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亦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地区。在这个阶段，既有张氏父子奉系军阀的统治与列强争夺中的自强，也有东北14年的沦陷史，更有东北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

总之，在中国东北这块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东北地方性的事件，更是全国性事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研究东北问题就不仅仅是地方性问题，也是全国性课题，甚至是世界性课题。其中，边疆与民族问题，又是其中重中之重的课题。

边疆与民族所涉猎的课题极广，从东北民族的起源，到东北疆域的形成沿革，再到东北区域文化与中华主体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近代东北地区的开埠到移民，再到东北城市进程以及近代以来东北社会风俗习惯变迁的研究；从跨界民族问题、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生语言问题，再到东北历史上地方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汉化政策研究以及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掠夺，等等，都可以囊括其中。这些问题不单单是东北地区本身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课题。

辽宁大学地处东北，占据地缘优势和资料上的便利条件。因此，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许多前辈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对有关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开发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出版了有关东北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数百篇，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研究项目数十项。其中，在全国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有范文澜《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及《清代全史》第9卷、李燕光教授的《东北地方史》及《满族通史》、宁梦辰教授的《东北地方史》、董守义教授主持的《辽河文化丛书》（12卷）、胡玉海教授主持的《奉系军阀全书》（6卷），等等。此外，由我院教师编校出版的《清初史料丛刊》在全国得到普遍认可，在清史研究资料工作上做了开创性工作。李林教授的《满族家谱研究》等，对满族的族源演变进行了实证性的开拓研究；孙文良教授主编的《满族大辞典》，从整体上对满族族源、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学术界定，奠定了满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历史文化学院还曾主办过全国第二届和第七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在东北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孙克复教授、关捷教授等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张德良教授、陈崇桥教授、周毅教授、胡玉海教授、马尚斌教授等对于奉系军阀及东北军史的研究，皆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了《明清战争史略》、《中国近代军事史》、《甲午海战史》、《甲午陆战史》、《奉系纵横》、《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外交》等著作。由上述学者进行的开拓性研究，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东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

上述所列研究工作，在全国学术界皆有口碑。与上述相对应，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还组建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在人才集聚、梯队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58年，辽宁大学就已组建了清史研究室；1978年全国史学研究规划会议上，将辽宁大学定为全国清史研究中心、辽金史研究中心；1966年，辽宁大学成立了东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多次承担有关部门课题。在2002年国

家适时启动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项目中，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其实力又获得多项课题立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参考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多年的建设，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已经形成了研究方向稳定且有特色，研究队伍整齐，年龄结构合理，研究经费相对充足，学术地位日渐提高的趋势；业已形成了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东北社会与民俗文化研究、东北政治与对外关系研究等三大方向，并形成了以任爽、张杰、焦润明、胡玉海、韩世明等17名教授、20名博士为骨干的稳定的研究队伍，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学术上和人才上的基础。

就全国而言，学术应有分工。合则成一整体，分则各有特色。应该说，经过数十年凝炼的“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领域，较好地体现了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同时，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与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史学同行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我们将重点放在具有辽海地区地域特点之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唐宋以来的东北史（重点是唐史、辽金史、清前及满族史、奉系与张氏父子研究）等领域。

在以上背景之下，在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中，“东北边疆与民族”被列为辽宁大学重点建设子项目。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陆续出版了。愿它们能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愿包括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内的中国高等学校历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史学之树常青！

辽宁大学“十五”“211”“东北边疆与民族”

子项目领导小组组长 丁海斌

2004年7月7日

## 绪论 生态人类学的视野与民族生境的概念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差异极大，使得分布于地球表面上的世界各民族的生存环境极不相同。居住在不同生态区位上的世界各民族民众，以其各自的生存智慧和文化创造，在对地球资源的利用上表现出千差万别的价值取向和利用方式，形成了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其中，许多民族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在今天仍程度不同地被其“文化持有者”所因袭，使得即使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滚滚大潮冲击下的今天，极目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文化图版仍呈现着异彩纷呈的多种样貌。

对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古往今来，人们的发现与兴趣大都集中在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样貌的体悟上。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对于文化的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必要或者说具有特定的意义，人们很少进行探究，似乎也没有何种契机与动因能调动起整个人类社会都为之思考。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全球化速度日益加快，曾几何时，世界上一些民族世代沿袭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惯习几乎顷刻间就被同化和消解了，一些传统的文化样式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文化持有者”的生活，甚至开始退出当代人的记忆。对此，痴迷于现代化物质成果中的人类社会并无多少理会，一些人甚至构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共性无疑会越来越大，终有一天，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也会消失，届时，整个人类将变成一个大的“民族”，而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将变成一个大的“地球村”……然而，沉醉在“地球村”构想中的现代人类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唤醒，人们越来越发现，现代化带给人类社会的并不全是福祉，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为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人口膨胀、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大自然开始向人类频频亮出“黄牌”，在世界各地，各种生态性灾难接踵而来，此伏彼起。于是，整个人类社会终于警醒起来，开始了对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展开了积极应对。在对人类的生存活动给地球生态环境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的反思与省查中，现代民众清醒地意识到，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生

活方式、习俗传统、思维观念实际上都与地球环境有着多维度的密切关联，直接作用于生态环境，并主导和制约着现代工业与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取决于整个人类的生态观和价值观。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源于世界各民族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着种种差异，而不同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伴生现象，造成文化差异的基础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手段差。面对地球上生态环境的多样化，这种手段差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所谓生态危机，说到底是在文化单一化的结果。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是当今人类社会缓解生态危机、合理利用地球资源的最具根本性的凭借。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同民族与群体的文化观念及文化传统将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怎样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如何将民族文化与其生境联系起来作出价值评判，为其进一步完善规划出正确的发展道路，是关系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地球生态保持平衡的大问题。

基于这样一个时代背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以及世界各民族文化与其生境关系的研究成为当代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热点，并由此催生了许多新的分支性学科，如生态人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在众多顺时而生的人文新学科中，生态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着力于从民族或区域的民众日常生活及习俗传统的角度探索民族、族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此构建起独特的研究视角，发展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生态人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当代的民族与区域文化研究中，正在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和肯定。生态人类学发展到今天，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以及富有卓见的研究视角，对于本书将要展开的满族生境与民俗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尤具方法学上的意义。

我们知道，当代的人类学研究对许多问题不再一味追求其规律和唯一的答案，而是试图发展各自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也许并不一定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终极性答案，但却仍有其耐人寻味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我们对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予以关注的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领域有关满族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发表有大量的论著与论文，可谓成果累累。然而，囿于人文学术研究整体上的时代局限性，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不免存在一些缺憾。由于研究者的思路仍有所阻滞，一些有关满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论著与论文，材料方面可谓丰富翔实，理论阐释却多陈陈相因，鲜有新见。同时，在研究倾向上也存在某种偏颇。从对满族历史与民族文化研究来看，研究者的思考



与结论多聚结在较为单一的观念层面，很少将满族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与其所依托的特定生境（自然、社会、文化个体相互作用的特定空间）视为一个互动系统进行整体审视。造成满族文化研究中一些视角被遮蔽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一些学者仍未摆脱长期以来在我国特有的学术思想史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在其研究中总是力图将研究对象最大限度地纯化，并刻意在其间建立起明确的因果关系，似乎非如此便不能视为研究的终结。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为例，在满族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中，对其构成互动与影响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族群生境对满族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容低估；在族群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构织中，满族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对这种耦合的渗透与影响也不容忽视。上述这一视角，恰恰在一些研究中被忽略了，以致在相关的研究中，至今鲜见从民族生境的角度对满族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进行系统性地剖析与阐释。若以人文学术研究“现在时”的视域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仅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伦理学等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出发，都难以对满族的历史与文化发展作科学而客观的审视与研究。尤其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上，文化和社会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为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现状<sup>①</sup>，为获取更为广泛的理论资源，必须打破学科疆界，“侵入”不同的学术领域，以一种“资源共享，方法互用”的现代学术理念，建立起更为科学的研究视角，如此才能在满族历史与文化研究这块被国内外满学、民族学、清史学界长久精耕细作的“文化热土”上有新的发现与思考。

总之，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当代人文研究的一个主要视角，虽然这种研究在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易融合的问题，但是正因为如此，这种性质的研究也更富有挑战性和创新性。各学科之间因差异而存在着张力，自然，也因差异而能够互补。

由于生态人类学在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中较好地整合了不同学科的学术资源，能够矫治传统的学术范式下易于被遮蔽的一些学术盲点，故而本书要进行的满族文化与民俗研究将主要立足于这一视角展开，更侧重于从满族所处的“生态”即特定的族群“生境”切入，对满族文化与民俗的发展及其变迁进行审视并展开研究。

<sup>①</sup> 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

从学术史上来看,生态人类学的产生与生态学的发展不无关联。“生态学”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 E. 海克尔 (E. Haeckel, 1834—1919) 1866 年提出来的。“生态学”的英文 Eco logy 来源于希腊文 Oikos logos。Oikos 意为 house, 即住所、家或栖息场所。logos 意为 study, 即研究, 词根与词尾合起来的意思是“生物栖息场所的研究”。海克尔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有机体及其与其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科学”, 认为:“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 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在海克尔身后的一些生态学家又进一步将生态学概括为“研究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这一定义反映了生态学的最基本的特点, 即生物具有适应复杂变化的环境的能力, 生物与其生存环境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sup>①</sup>从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及至 20 世纪初的几十年, 生态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生物及其物种与其生存环境的生物学关系的研究上。到了 20 世纪初, 人文科学领域开始将生态学的一些理论与原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中来, “生态”作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问题, 开始超越自然的边界, 蔓延进社会领域和人文领域, 逐步渗入到有关人类社会的种族、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研究之中。

在 20 世纪以来对生态文化的多角度研究中, 许多敏感的学者越来越认识到: 生态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意味着人类和环境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具有浓重的悲怆性。现代生态学这个从总体上研究以人为主体的、以生态系统为重心、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和解除人类困境为己任、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前沿学科群, 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沟通现在与未来的双向性。它既有立足现在, 探索、洞察和规划未来的性质; 也有立足未来, 评估、审视和检验人类现在决策与行为的性质。现代生态学向我们提供的显然是一种与传统有别的自然观, 这种自然观正是我们以往的研究视角所缺乏的。由于现代生态学为人类社会生活和文化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理论, 因而这一学科又被人们称为“颠覆性的科学”(the subversive science)。现代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 而衍化成为一种观点, 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理论, 一种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不但生态学的一些思想、观念和见解已被世界各民族民众广泛接受, 而且生态学的整体论自然观和价值观作为反思生态危机、批评机械论自然观和人类

<sup>①</sup> 李博主编:《生态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3—4 页。

中心主义的科学理论依据，也逐渐被众多的学科所吸收、借鉴。

生态人类学 (ecologicalanthropology) 是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阵阵痉挛和频频剧痛中崛起的。“生态人类学”这一名词 1968 年由美国学者维达 (A. P. Vayda) 和拉帕波特 (R. A. Rappaport) 首次提出，但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生态人类学的真正开创者是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因为生态人类学是由斯图尔德构建的文化生态学发展而来。何来此说？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及其理论发展的过程。自人类学科创建以来，有关人类文化与环境的关系一直是一些学者研究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相继形成了一些理论和学派，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依次为以下几种：(1) 依据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论”而形成的环境决定论。该理论主张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特点可以由它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强调环境是决定人类社会和文化特点的决定性因素。(2)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开创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在对人类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环境可能论。该理论认为环境不是积极地模塑人类文化，而只是在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水平上作一些限制，它只是指令 (dictating) 事物的可能性。与环境决定论相比，环境可能论也未能为破解人类文化之谜提供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性框架，因为环境可能论仍然无法解释人们的经济策略与政治策略的细节、人们的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内容、人们的婚姻优先性 (preference) 及仪式表演 (ritual-performance)。(3)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J. H. Steward) 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文化生态学理论开辟了人类学关于生态研究的新视野，斯图尔德本人也因此被认为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真正开创者。

斯图尔德 1955 年出版了《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将生态学思想引入人类学的领域，为文化生态学建立起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的程度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他把这种文化中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的部分称为“文化核心”。按照同样的道理，有些环境因素对文化形式的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环境因素。越是简单的和早期的人类社会，受环境的影响就越直接。地形、动物群和植物群的不同，会使人们使用不同的技术和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他给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规定了三个程序：

- 第一，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 第二，分析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
- 第三，分析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影响的程度。

他以对美国西部的印第安人派尤特、肖肖尼等狩猎—采集人群的居住环

境和生产生活的深入研究为例，对这一研究视角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他的研究中，第一次使用“文化生态”概念来解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问题。斯图尔德将阐释不同地域的特殊文化特质和文化类型的研究领域确定为文化生态学，他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决定生产活动、再决定生活方式和组织类型的理论实质是想证实：文化与自然环境虽然是相互作用的，但是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它不仅允许或阻碍文化发明的运用，而且往往还会引起具有深远后果的社会适应。当然，若以学术发展到今天的视角来看，斯图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意图在于反对环境决定论。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理论和方法恰恰支持和加强了环境决定论，因为在其实际研究中，人们很难将文化特征作以上区分，因此，他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不能支持他的理论观点。其次，他提出的“文化核心”概念只包括技术，而不包括仪式和意识形态，而实际上后两者也与环境相互作用；同时，他所指称的“环境特征”也存在较大局限性，并不包括该环境内的其他生物如其他人群等，而实际上这些都是构成其环境特征的因素之一。再次，文化生态学在研究方法上排除了生态学的方法，没有对文化与生物学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如此等等。但文化生态学所强调的环境和文化不可分离，它们相互定义对方，两者处于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是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另一个贡献是其研究方法，斯图尔德详细地研究地域集团的生产方式和生息环境的方法论，成为此后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也因此常被称为生态人类学。确切地说，是斯图尔德有关文化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建树，才使生态人类学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

斯图尔德构建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大大激发了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灵感。此后，又有一批颇有影响的人类学家以其富有个性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此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康克林(H. C. Conklin)在对菲律宾哈努诺人进行调查与研究提出的民族生态学理论。民族生态学以结构语言学的手段了解当地人对环境的感知，从而得到当地人的世界观，认为环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文化建构出来的，是感知和阐释外部世界的产物。民族生态学主张文化不可比较，代表了极端文化相对论思想。1963年，格尔茨发表了他的新作《农业退化》，成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格尔茨的研究根植于文化生态学，却建立在系统概念的基础之上，即他的观察基于系统概念，因此，他的理论又被称为系统生态学。格

尔茨指称的“系统”概念谓指“一组事物以及该组各个事物之间及其属性之间有各种关系的总和”。与以往的文化研究重点在于找出两个事物或过程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的学术范式不同，系统生态学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一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复杂网络。系统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要确立系统的界域与环境，其次要建立复杂事物的系统模型。格尔茨认为系统生态学的研究重心是关注文化、生物和环境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在格尔茨之后，拉帕波特等学者将生态系统的概念也引入到人类学研究中。他们将人类视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探讨人与自然中能量的流动和人在食物网中与其他动物的关系，这使得他们与格尔茨一起被称为系统生态学的代表。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论。马文·哈里斯是斯图尔德和怀特的学生，他所提出的文化唯物论代表了部分人类学家试图将客位分析框架与内在认知分类的主位框架以及微观和宏观分析整合在一起的一种研究与分析尝试。文化唯物论的核心观点是：所有文化特征都是人类对于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哈里斯对生态人类学，或者说是整个人类学的贡献即在于他所提出的主位和客位的研究方法。正是由于这些著名的人类学家的理论加盟，到20世纪80年代，生态人类学已经成为人类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如同有的学者所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研究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sup>①</sup>

对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们的理解略有不同。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认为，生态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对环境的适应及其进化的人类学的一个领域。它不仅研究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还研究这种相互关系产生的影响和被影响的文化（观念）体系间的相互关系。在人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人口结构、社会组织、技术、环境等是作为重要的结构因素包括在内的。获得食物的活动和维持人口的活动是有关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动，特别是为获得食物的集团、活动、技术等被总称为“生计方式”。这个生计方式往往是了解人口结构、社会组织、文化体系的基础。尤其在极易受自然环境直接影响的狩猎采集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等自给自足的简单社会中，其生计方式也往往集中体现了该社会或群体在文化建构方面的主要特征。维持人口的活动虽被称为繁殖方式，但不单单只是受食物获得的量的影响，还受人口的人为安排、婚姻制度等社会文化的影响。因此，

<sup>①</sup> [日]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

在考虑人类生活时，就必须考察食物资源的分布、生计方式和繁殖方式等三个问题。在生态人类学中，生计方式是最基本的研究问题。然而在社会分层发达的复合社会中，除生计方式外，还要考虑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对此，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采用直接观察和仪器测量。<sup>①</sup>中国学者宋蜀华则将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他认为，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因而研究人类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的特点、方式及规律，并寻求合理利用和改造生态环境，从生态学角度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它的研究内容包括：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与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sup>②</sup>从以上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把握来看，这一学科所关注的问题毋庸置疑地具有当代社会人文学术研究的前沿性质。

生态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以开放性的学科界域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有关生态文化研究的成果，尤其现代生态学从总体上研究以人为主体、以生态系统为重心、以参与解决全球问题和解除人类困境为己任、探索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研究理念，对于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启迪。同时，生态人类学还从生态学中引进了一些相关概念，我们注意到，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语境中，一些生态学的概念已经被重新界定，融入了更多的人文研究元素，与生态学拉开了距离。对“生境”概念的引进，便是最好的例证。

生境 (habitat) 是当代人类学在族群文化研究中频繁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研究者关注的要项。生境原是生态学的一个概念，特指具体的生物个体或群体生活地段上的生态环境与生物影响下的次生环境（生物本身对环境的影响）。1956年，人类学家巴斯在研究巴基斯坦北部的三个毗邻民族时首

---

① [日] 绫部恒雄：《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② 宋蜀华：《人类学与研究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载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页。

次从生态学中引入了“小生境”这一概念，用其比喻这三个毗邻民族的分布如同不同的生物物种分布于不同的自然环境区位。<sup>①</sup>客观地说，巴斯引入这一概念对探讨人类文化与生态系统的互动关系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但他引入这一概念的依据却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当然，人类学界对生境一词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的人类学家们一般都把生境仅仅理解为纯自然的生存空间，并没有把生境作为民族的特征来看待和加以研究。随着人类学研究的深入以及生态问题研究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围绕在一个民族或人类群体的外部环境并非是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人类加工改造的结果。人类加工改造环境需要凭借社会的力量，加工改造的结果自然带有社会性。因此，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就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环境，而是社会模塑的有交流的人为体系了。这个经由特定文化加工，并与特定文化相应的人为外部空间体系，包括两大部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这两大部分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物质与精神的随机组合，由此才真正构成一个民族完整的生境。

生态人类学研究话语中的“民族生境”概念，与生态学所指称的“生境”有着原则性的区别，被赋予了人文研究特有的语境意义，专门用来指代民族文化与其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在特定结合部的相互互动关系。<sup>②</sup>具体说来，在生态学所指的“生境”中，一个生物物种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是直接地建立关系，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均衡地发生关系；而在生态人类学所指的“民族生境”中，一个民族并不是像生物物种那样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发生直接关系，而是能动地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某些特有部分建立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一个结合部，在这个结合部，相关的民族文化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发生了密集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在这一点上，民族文化与生物物种有着明显的区别。生态人类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沿用了从生态学中引用的“生境”概念。

总体来看，一个民族的生境具有以下三种基本特性：

一是社会性。一个民族对其客观的外部环境并非百分之百地加以利用，而是按照该民族自身的文化特征，有选择地利用其中容易利用的部分，这是民族生境具有社会性的表现之一。一个民族对其外部环境的加工改造手段往

① [美] 内亨：《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原载《民族译丛》1985年第3期，第26页。

② 杨庭硕、吕永锋：《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4页。

往与其他民族不同,加工手段则是该民族文化制约的结果,这是民族生境具有社会性的表现之二。一个民族要加工改造外部环境,需要本民族成员的协调工作,不同的民族协调本民族成员的方式各不相同,加工改造外部环境的结果也必然互有区别,这是民族生境具有社会性的第三种表现。鉴于与特定民族发生关系的外部环境已经不是纯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留下该民族在其文化归属下汰选加工和整理后的痕迹,并使之协调化和系统化的特有生存空间,这样的生存空间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的需要,它已经和社会紧密结合,成为该民族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才是该民族的生存环境。

二是文化归属性。我们提到一种生存环境时,必然是针对特定的文化而言的,没有文化归属的民族生境是不存在的,此即生境的文化归属性。

三是系统性。民族生境的文化归属性,必然导致一个民族与其外部环境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呈现出层次性的差异。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的各组成部分,有的互动密切,有的关系疏远,有的甚至完全无关。这种层次性的差异即为民族生境的系统性特点。<sup>①</sup>

民族生境的客观存在及其上述基本特性适用于所有的民族。

综上,我们以相当的篇幅对生态人类学的产生及其理论发展作了大抵勾勒。可以看出,生态人类学是借用生态学的知识、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生态人类学的显著特点是突破了人类学科传统的学术范式,对众多人文与自然学科的有效资源进行了整合,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独特的视角,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结合部上深入探索人类的文化之谜,其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跨学科特点。由于生态人类学在阐释不同民族的“文化之谜”以及文化疑难问题时,能够兼顾到文化的、社会的方面和生物的、生态的方面,因而为当代社会进行民族与生态文化研究时寻求一种较为深层的、更接近于客观和真实的答案提供了学理上的可能。

以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以满族民俗文化为对象,进行族群与生境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富有“诗意的栖居”——这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学意义的。纵观满族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不难看出,满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传统,思维观念,都与民族所处的生境有着多维度的密切关联。作为满族文化重要构成的民俗文化,就其本性来讲,可以说更是直接地

<sup>①</sup> 参见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页。



体现着这一原则。我们说,任何一种文化,不论其居于强势还是弱势,不论其从表面看来有多少缺陷和不足,都是不同的人类群体立足于特定的生态环境而创造的文明财富,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肯定有其可取之处和存在的价值。每一民族的文化类型,都是适应于各自生境的不同样式的具体文化,实现现代化就必然带有特定的生境对应性,因而,实现现代化就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含义。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满族民众而言,所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显然不可能照搬已有的任何一种具体的先进文化,而只能是在充分认识自身所处的生境特征后,通过借鉴和吸收,按照特定区域内民族已有的传统,来构建符合本民族需要、又能有效地适应本民族所处生境的新文化,这就是现代化必然包含的地域性与民族性内涵。

满族民俗是最富有区域性与族群性特点并和东北区域社会的传统历史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文化事象。满族民俗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传统的再现,我们甚至还可以隐约地感受到隐含其中的某种超越工业化、现代化的胚芽。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呼应与联系,就在于满族民俗文化具有的独特性、传统性和文化性,在于其中涵盖了一个特定的民族、民众千百年的生存经验和智慧。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区域性与民族性文化,具有某种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它与现代化的模式有着某些距离,但在许多方面却与后现代的思考 and 理论有着可以呼应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于在奔向现代化的一路高歌猛进之后,我国社会已逐渐步入理性的发展阶段,同时,与当代中国目前已开始弥漫着的一种文化上的返璞归真、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价值评估等后现代思潮有关。本书对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关系问题的提出,意在吁请人们关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本质意义,尊重多元化的民族民俗文化价值,提倡不同民族在奔向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方向或道路上具有多样性、多向性的自主选择,唤起更多的人关注民族社会的发展问题,并将此问题拓展到对特定民族、民众的生存关怀这一根本性主题上,从而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得以深化。